

红色旅游发展与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

张科¹ 熊子怡¹ 黄细嘉² 赵磊³

摘要: 作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不仅是一项政治工程,也是一项经济工程、富民工程。但是,发展红色旅游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革命老区城乡统筹发展,一直缺乏应有的系统证据。本文以革命老区县域为研究对象,基于“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红色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发展红色旅游可以显著缩小革命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集体经济发展可以强化这一效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发展红色旅游通过促进革命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投资和非农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第三产业发展较落后和宗族文化较浓厚的地区,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如何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旅游资源,以巩固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革命老区 红色旅游 城乡收入差距 集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23.4; F592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囿于要素获取、产业建构和区位因素,长期以来,革命老区,尤其是革命老区的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经济高质量发展潜力尚待挖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积极进行顶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编号:21&ZD17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旅游业与农村贫困减缓: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编号:22FGLB070)的资助和浙江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秀青年学者专项“旅游业、城乡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GB202202004)。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熊子怡。

^①资料来源:《历史性的跨越 新奋斗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论述综述》, https://www.nrra.gov.cn/art/2021/2/24/art_624_187383.html。

层设计,着力构建振兴革命老区的全局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政策,特别是在出台《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基础上,批准了支持陕甘宁、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左右江、大别山、川陕5个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专项规划,重点部署并实施了一批重大关键性项目,逐渐勾勒出支持革命老区发展的“1258”政策体系。在此背景下,尽管革命老区城乡经济整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相较于非革命老区,革命老区依然面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基本事实(张启正等,2022)。因此,加快发展革命老区农村经济,缩小革命老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关涉革命老区全面振兴与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

为何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大于其他地区?首先,可以根据收入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理论解释。伴随农业生产向工业化过渡,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呈现倒U型形态。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当经济发展至某个阈值时,城乡收入差距会收敛于一个最高点;此后,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已有文献证实,收入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且大部分地区已经跨过“倒U”的“拐点”(赵昕东和沈承放,2022)。然而,一个直观的判断是,长期以来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部分革命老区可能并未完全越过“拐点”。就算越过了“拐点”,但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依然落后于其他地区,整体上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大于非革命老区(Jia et al., 2020)。其次,另有研究表明,如果某些外在条件不变,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先升后降,而可能进入“拉美陷阱”(Hartley et al., 2022)。一方面,革命老区长期受困于外部投资乏力、产业体系单一和人力资本薄弱等“资源诅咒”的问题,难以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导致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李晓园等,2022)。吕炜和许宏伟(2015)研究指出,中国独有的分权和竞争制度模式,驱动政府不断采取偏向性产业发展政策,导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造成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可能是城乡公共服务配置失衡(Jia et al., 2020)。骆永民等(2020)研究指出,加大农村基础公共品供给可以提升农业生产率,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更多地向非农部门转移,从而提高农民收入。这与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理论逻辑不谋而合。因此,如何破除“资源诅咒”以促进革命老区农村产业发展和公共品供给,是推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作为革命老区特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普遍被视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工具(龚斌磊等,2022;李晓园等,2022)。红色旅游产业发展通过因地制宜地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挖掘红色文化价值,产生红色经济效益,推动革命老区城乡统筹发展。从产业发展角度看,红色旅游在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革命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增强村民幸福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罗利玉,2021);从公共服务角度看,红色旅游支持政策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专项资金(左冰,2022),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资金预算约束,促进革命老区农村地区卫生、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不断完善(杨友宝等,2022)。并且,部分研究也指出,发展红色旅游可以通过培育革命老区特色优势产业、改善营商环境、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刺激消费需求,推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然而,已有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理论和定性角度,分析和论述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的乡村振兴效应,但对其因果关系缺乏系统理论阐释和科学定量识别,因此难以准确评估红色旅游发

展对革命老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净效应；另一方面，虽然部分学者利用案例研究对红色旅游发展的乡村振兴效应进行了剖析，但大部分案例局限于某个景区、村落，并且跟踪时间较短，导致研究结论不具备普适性。有鉴于此，本文对红色旅游发展如何影响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从红色旅游发展视角揭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诸多影响因素，也为进一步发展红色旅游提供实践参考依据。

自2004年12月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分批次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上文件在下文中统称为《纲要》），指导和规范地方政府发展红色旅游，以实现红色旅游发展与脱贫攻坚、区域发展、城乡建设的有效衔接。同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分别于2005年、2011年和2016年公布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名录》《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三批名录》（以上文件在下文中统称为《名录》）建设方案^①，以推进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开发建设。这为本文识别红色旅游发展是否能缩小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革命老区县域面板数据，根据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所在县域以及入选年份，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基于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在克服内生性的前提下，识别红色旅游发展与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有助于从红色旅游发展视角为革命老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新的经验参考。第二，现有文献主要从文化和旅游资源集聚视角讨论红色旅游发展的社会效应，本文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进一步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社会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第三，本文分别从集体经济、宗族文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视角，揭示红色旅游发展影响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效应，为革命老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红色旅游产业政策，进而促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设计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红色旅游发展与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

革命老区大部分位于以山区为主的多省份交界地区，在革命战争时期，因其自然禀赋和社会历史条件成为党和军队生存发展的天然屏障。然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自然、交通、区位和产业落后等多重因素影响。上述因素已经成为革命老区发展的掣肘因素，导致革命老区长期以来引资能力较弱、产业结构单一、城乡公共服务失衡。基于此，本文将从革命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投资和非农就业等角度，讨论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第一，基础公共品供给是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保障，因此，发展红色旅游有助于促进革命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典的中心地理论强调，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公共服务

^①参见《关于印发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通知》，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612/t20161230_962839.html。

对地区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Lotfalipour et al., 2021)。革命老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特殊的政治资源禀赋,但一直存在公共投资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公共服务落后等问题。这种现象在革命老区的农村地区更明显 (王守坤, 2017)。首先,发展红色旅游可以建立城乡间多通道的交通网络,实现老区城乡“航空、铁路、公路”三衔接的联合交通模式 (左冰, 2022)。这不仅可以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均等化,还能提升劳动力迁移效率,缩小工农劳动生产率差距,从而逐步提升农民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 (骆永民等, 2020)。其次,发展红色旅游不仅加强了革命老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也提升了电信网络信息服务以及卫生教育等基础公共服务水平。这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村地区的信息软约束,优化农村内部资源配置以及加速资源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流动,促进农户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朱秋博等, 2022); 另一方面有助于补齐革命老区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陈秋红, 2019)。

第二,发展红色旅游需要充分利用革命老区农村资源,这有助于促进农村投资和农民非农就业,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长期以来,政府采用城市偏向型要素资源投入政策,虽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造成了城市与农村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并且这种现象在经济落后地区更为突出 (吕炜和许宏伟, 2015)。发展红色旅游需要充分发掘革命老区城乡红色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形成差异化红色旅游产品,因此红色旅游产业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从投资视角看,革命老区,尤其是革命老区的农村地区保存有红色遗址、红色遗物和红色事迹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红色资源会引导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地区,从而以投资驱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从就业视角看,红色旅游发展需要依靠当地村民。首先,村民对当地红色先驱事迹更为了解,因此村民可以担当起红色事迹讲述者、红色遗址守护者、红色文化传承者等角色,这有助于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其次,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还是现代服务业,因此其发展需要大量低技能劳动力资源 (林淑君等, 2022),并且这些工作很难被机器所替代,这也保证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1。

H1: 红色旅游发展通过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投资和非农就业缩小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

(二) 集体经济的调节效应

一方面,集体经济发展可以强化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这种关系强调“内外有别”,无疑会加剧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市场交易成本 (周娟, 2021)。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农民的机会主义倾向、企业的剥削行为等因素会导致农村产业发展存在高违约率、低稳定性和绩效较差等问题 (Almond et al., 2019; 陈军亚, 2019)。这些都会成为红色旅游发展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经济发展可以与红色旅游产业形成协同互补机制。首先,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构成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利益相关方,而集体经济组织能有效促进三者之间的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促进红色旅游发展。其次,相较于完全依赖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机制,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先天资源整合优势 (周娟, 2020)。红色旅游发展所需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都是以村庄为单位被村民自治组织所掌握,红色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最终也会以村庄为单位进行。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一般以村或组为设置单位,在组织农村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社会资源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与此同时,

村集体企业管理者与村委会大多是“二合一”，普遍存在村委会代行村集体企业组织管理职能的现象。这种合并可以节省治理成本，也能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

另一方面，集体经济发展可以保证红色旅游发展的红利在城乡间合理分配。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组织等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根本保障，因此，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促使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红利在城乡间合理分配（朱冬亮，2020）。首先，集体经济组织不仅可以引导城镇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还可以抑制城镇对农村资源的虹吸作用（谢莉娟等，2021）。其次，集体经济组织为农业富余劳动力由农业向要素报酬更高的第三产业转移提供了必要条件（陈锡文，2022），并且在保障村民股份分红的基础上，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资金保障，这对于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周娟，2020）。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2。

H2: 集体经济发展会正向调节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理论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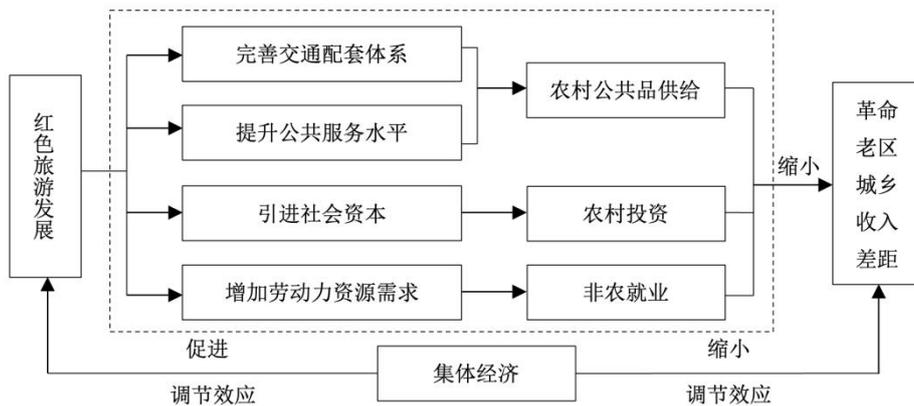


图 1 红色旅游发展影响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

三、识别策略、变量与数据

（一）识别策略

红色旅游发展的典型特征就是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本文参考谭娜等（2022）的研究设计，利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分别于 2005 年、2011 年和 2016 年公布的《名录》中各地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时间上的差异，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名录》共包含 300 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分别位于超过 360 个不同的县（市、区）^①。考虑到本文主要以革命老区县域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需要足够多的对照组，本文使用 2002—2020 年

^①部分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由多个不同景点组成，比如九江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由庐山会议旧址及领袖旧居群、98 抗洪精神教育基地、共青团创业史陈列馆以及八一起义策源地暨叶挺九江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组成。

中国 997 个革命老区县域面板数据。在本文的县域样本中，有 181 个县域至少拥有一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所以这 181 个县域构成了本文的实验组，而其他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革命老区县域则构成了对照组。具体实证模型如下：

$$Gap_{i,t} = \beta_0 + \beta_1 Red_tourism_{i,t} + \beta_2 Controls_{i,t-1} + Coun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1) 式中： $Gap_{i,t}$ 为城乡收入差距，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县域和第 t 年； $Red_tourism_{i,t}$ 表示红色旅游发展； $Controls_{i,t-1}$ 表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且随县域和年份变动的控制变量集合，并滞后一期； $County_i$ 表示县域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 $Year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因素；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β_0 、 β_1 和 β_2 为待估计参数。本文着重关注 $Red_tourism_{i,t}$ 的系数，若红色旅游发展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 $Red_tourism_{i,t}$ 变量显著且 β_1 为负数。

在 (1) 式的基础上，为考察集体经济发展是否有助于正向调节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本文在模型中加入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以及红色旅游发展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

$$Gap_{i,t} = \beta_0 + \beta_1 Red_tourism_{i,t} \times Collectivity_{i,t} + \beta_2 Red_tourism_{i,t} + \beta_3 Collectivity_{i,t} + \beta_4 Controls_{i,t-1} + Coun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2) 式中： $Collectivity_{i,t}$ 为 i 县域在 t 年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Red_tourism_{i,t} \times Collectivity_{i,t}$ 为红色旅游发展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其他变量含义与 (1) 式相同。若交互项显著，且 β_1 为负数，则说明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正向调节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讨红色旅游发展影响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Mechanism_{i,t} = \beta_0 + \beta_1 Red_tourism_{i,t} + \beta_2 Controls_{i,t-1} + Coun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3) 式中： $Mechanism_{i,t}$ 为机制变量，包括农村公共品、农村投资和非农就业变量。其余变量和参数设定均与 (1) 式和 (2) 式相同。

(二) 变量定义与测度方法

1.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参考李永友和王超 (2020) 的研究方法，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在稳健性检验中，利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替代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红色旅游发展。本文参考谭娜等 (2022) 的研究方法，将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将其作为红色旅游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具体而言，参考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设定方法，考察县域当年是否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若是，则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3. 调节变量：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将每万人集体企业数量作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数据获取的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利用 Python 爬虫软件从企查查网站获取集体所有制企业信息；其次，剔除当年已经被吊销和注销的企业；最后，根据集体企业注册地址，汇总各县域各年份集体企业数量。为排除县域人口规模差异造成的影响，本文基于县域人口数量对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4.作用机制变量。①农村公共品。本文使用县乡公路里程、乡卫生院床位数、乡卫生院技术人员数、农村电话年末用户数和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来衡量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②农村投资。本文利用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县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差来衡量县域农村投资水平。③非农就业。本文采用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数来衡量非农就业水平。

5.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参考李永友和王超（2020）等的做法，选择了一系列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人口规模、通信基础设施水平、互联网普及水平、政府规模、金融规模。考虑到“国家级贫困县”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可能会对模型结果产生影响，本文也对这两项政策进行控制。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①。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2.79	1.36	18888
红色旅游发展	当年是否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是=1，否=0	0.12	0.33	18888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每万人集体企业数量（个）	0.12	0.17	18888
县乡公路里程	县乡公路里程（公里）	497	41	1206
乡卫生院床位数	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万张）	0.20	0.11	1206
乡卫生院技术人员数	乡镇卫生院技术人员数（人）	1260	95	1206
农村电话年末用户数	农村电话年末用户数（万户）	3.39	0.99	1206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	3.06	1.18	1206
农村投资	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县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差（万元）	59873	9641	18888
非农就业	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数（万人）	11.75	10.06	18888
人口规模	县域年末总人口（万人）	44.15	7.88	18888
通信基础设施水平	县域固定电话用户数（户）	51021	4519	18888
互联网普及水平	县域宽带接入用户数（户）	34543	2711	18888
政府规模	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万元）	32208	4283	18888
金融规模	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万元）	358612	35331	18888
国家级贫困县	是否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是=1，否=0	0.12	0.33	18888
乡村旅游示范县	当年是否属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是=1，否=0	0.05	0.21	18888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2—2020年革命老区997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最终得到18888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革命老区县域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区

^①在实证模型中，县乡公路里程、乡卫生院床位数、乡卫生院技术人员数、农村电话年末用户数、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农村投资、人口规模、通信基础设施水平、互联网普及水平、政府规模和金融规模变量均加1取自然对数。

网^①。第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公布的《名录》。第三，计算县域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所使用的县域集体企业数量数据来源于企查查网站^②。第四，农村公共品机制变量数据来源于2003—2021年（历年）《江西统计年鉴》。第五，其余变量数据来源于2003—2021年（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和各县域的统计年鉴。此外，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也使用到非革命老区县域的面板数据，其数据来源与革命老区县域相同。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依据（1）式，本文检验了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1）列结果显示，在仅控制县域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红色旅游发展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红色旅游发展可以显著缩小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2）列进一步加入了人口规模、通信基础设施水平、互联网普及水平、政府规模、金融规模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红色旅游发展变量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在控制了一系列县域特征后，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存在明显的抑制效应，假说H1得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城乡收入差距			
	（1）		（2）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红色旅游发展	-0.347***	0.112	-0.278***	0.104
人口规模			0.666***	0.243
通信基础设施水平			-0.311***	0.052
互联网普及水平			0.436***	0.062
政府规模			0.269	0.239
金融规模			-0.272**	0.137
国家级贫困县			-0.105	0.124
乡村旅游示范县			-0.215***	0.059
常数项	3.730***	0.051	-0.221	1.573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326		0.384
观测值		18888		18888

注：***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

^①中国老区网网址：<http://www.zhongguolaoqu.com/main/lqgc/>。

^②企查查网站：<https://www.qcc.com/>。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满足干预前平行趋势假设，以保证在政策事件发生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在本文基准模型中，平行趋势假设是指在获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前，实验组县域和对照组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应保持相同的变动趋势。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为直观展示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本文绘制了在 90% 的置信区间下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回归系数图，如图 2 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事前政策时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异于 0，且系数值变动较平缓，表明本文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政策干预前平行趋势的假设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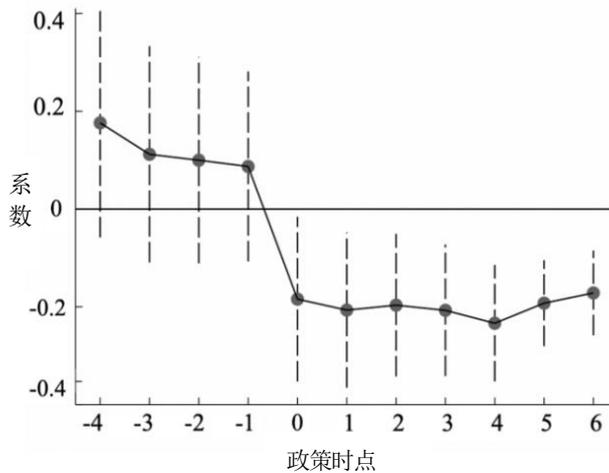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2. 工具变量法。虽然在上文中，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并且尽可能控制了县域特征，但是依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做检验。具体地，本文使用县域拥有开国将帅数量这一历史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选取该工具变量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一个县域拥有的开国将帅越多，该县域拥有的红色英雄故事就越多，那么该县域建设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发展红色旅游的概率就越大。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由于军事装备落后，主要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迂回战术，大部分时间并未有固定的军事培训基地，大量战士军官都是“边打边征”。因此，一个县域拥有的开国将帅越多，该县域拥有的红色纪念地、红色标志物和革命事迹就越多，即红色旅游资源就越多。与此同时，一个县域是否拥有以及拥有多少开国将帅，与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并不直接相关。因此，该工具变量同时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假设，符合工具变量选取要求。公开资料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是 1955—1965 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以后，被授予将帅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统称，总共包括 10 名元帅、10 名大将、57 名上将、177 名中将军和 1360 名少将^①。本文通过以下处理方式获得各县域拥有的开国将帅数量：

^①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1955—1965）》，http://www.81.cn/jwzl/2015-09/16/content_6684058.htm?from=singlemessage。

先手工收集上述开国将帅相关资料，但是囿于部分数据缺失，最终获取 1447 名开国将帅的祖籍地或出生地（如果出生地和祖籍地不一致，以出生地为准）信息，再将这些信息匹配至县域层面，然后进行汇总。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县域开国将帅数量这一历史变量不随时间变动，为了保证基于面板数据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将县域开国将帅数量与年份进行交乘并做标准化处理。

为了进一步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本文引入地形起伏度与年份的交互项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具体地，本文基于中国地理 100 米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采用 ArcGIS 软件计算获得各县域的地形起伏度数据，并将县域地形起伏度与年份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地形起伏度越大意味着该地区曾经发生革命战争的概率越高，越可能拥有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县域拥有红色景区的概率就越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地形复杂的山地更容易开展游击战。这就使得地形起伏度与红色景区建设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地形起伏度很难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可见，该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高度正相关，与被解释变量不直接相关，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要求。

表 3（1）列和（2）列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负。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弱工具变量 F 值均大于 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 19.93，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与此同时，为检验过度识别问题以保证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假设，本文将开国将帅数量与年份交互项和地形起伏度与年份交互项同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3（3）列所示。结果显示，过度识别检验并不显著，意味着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假设。以上结果表明，经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缓解内生性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 3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城乡收入差距		
	(1)	(2)	(3)
红色旅游发展	-2.774*** (0.255)	-5.611*** (0.930)	-1.018*** (0.343)
常数项	3.246*** (0.053)	1.136* (0.689)	3.430*** (0.92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125	0.549	0.331
观测值	18888	18888	18888
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	31.951	22.428	241.276
过度识别检验p值			0.303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3.安慰剂检验。对于本文结论另外一个可能的质疑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很可能来自某些不可观测的随机因素。为此，本文构造安慰剂检验，以判断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是否由其他因素导致。根据实际分组情况，本文按照各年度实验组县域的实际数量，逐年随机抽取与该

数量相同的县域生成“伪实验组”，并重复执行500次回归。500次重新分组的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分布服从正态分布，并且大多数估计值的 p 值都大于0.1，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本文的估计结果并非偶然得到^①。

4. 改变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为了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参考李永友和王超（2020）的做法，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并代入（1）式重新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县域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5. 重新选取对照组。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可能是因为拥有某些特征才会建设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而这些特征难以进行定量识别，但是这些特征可能对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因此，本文重新选择对照组以排除这一可能的干扰。具体地，本文将所有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样本删除，只保留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样本，重新回归。需要强调的是，实验组的政策实施时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去除原对照组样本后，原实验组由于政策实施时间不同，依然可以构造双重差分。结果显示，在重新设定对照组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6. 倾向得分匹配。前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这一方法并不能完全消除由样本自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下的双重差分模型来缓解样本自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先利用基准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采用1对3最近邻匹配法（卡尺0.05）进行匹配，匹配后的控制变量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然后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重新匹配样本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进一步说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7. 针对分组构造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将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定义为实验组，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定义为对照组。考虑到某县域拥有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为了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选取新标准界定红色旅游发展。具体地，在前文基础上，将实验组重新定义为拥有两个及以上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对照组依然为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仍然存在。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8. 排除替代性假说。考虑到双重差分的潜在满足条件是单位处理变量值稳定假设，在理想情况下，实验组和对照组被严格区分开来，彼此互不干涉。然而，在现实中，很多政策冲击可能具有溢出效应，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在本文研究的场景中，《名录》政策也可能影响未被纳入《名录》革命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从而造成本文研究结论有偏。为排除这一替代性假说，本文进行两个检验。第一，将对照组替换为非革命老区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因为相较于革命老区，非革命老区受到

^①受篇幅所限，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展示。

《名录》这一政策的影响较弱,即如果替换对照组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且系数为负,则可排除“《名录》政策也可能影响未被纳入的革命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替代性假说。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系数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第二,如果《名录》这一政策会影响所有革命老区,那么未进入该名单的革命老区县域也可能发展红色旅游,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如果该假说成立,那么本文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为了排除这一替代性假说,本文将样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政策冲击年份为2005年。这部分检验仅保留2003—2007年样本,删除其余样本,实验组为革命老区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对照组为非革命老区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第二部分,政策冲击年份为2011年。这部分检验仅保留2009—2013年样本,删除其余样本,实验组为革命老区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对照组为非革命老区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第三部分,政策冲击年份为2016年。这部分检验仅保留2014—2018年样本,删除其余样本,实验组为革命老区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对照组为非革命老区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县域。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并不显著。这进一步排除了“《名录》政策也可能影响未被纳入的革命老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替代性假说,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9.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稳健估计。在双向固定效应框架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核心估计系数是多组基本双重差分估计量的加权平均,并非真实的处理效应,特别是当处理效应存在组别和时间异质性时,双向固定效应框架下的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可能存在较大偏误。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从未接受处理的革命老区县域共有816个,约占总样本县的82%,先后接受处理的样本只占总样本的18%。因此,本文基准回归所得到的估计结果主要来自基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子样本回归得到的估计量,而基于第四类子样本回归得到的有偏估计量所占的权重很小。由此可以推测,基准回归中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的偏误很小。尽管如此,根据上述推测得出基准回归中估计量稳健的结论可能不够严谨。因此,本文基于Baker et al. (2022)提出的两阶段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如下:第一阶段利用未受处理的观测数据来估计一个无政策处理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第二阶段从观测数据中消除组别和时期效应及协变量影响,并用所得余值与政策处理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在排除这一干扰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三) 集体经济的调节效应

为了验证假说H2,即集体经济发展有利于正向调节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本文选用县域每万人集体企业数量作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代入(2)式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红色旅游发展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负。这意味着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正向调节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假说H2得证。上述检验结果符合现实观察。例如,1978年冬,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方式,冒险尝试农业“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小岗村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近年来,小岗村先后荣获全国十大名村、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多项殊荣,并且建设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是安徽省重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小岗村在村级产业管委会制定旅游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集体经济资源调配的优势,促进红色旅游产业乡村振兴效用最

大化。2019年，小岗村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6亿元，集体经济收入11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600元，基本实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红色旅游致富的新格局^①。

表4 集体经济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城乡收入差距			
	(1)		(2)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红色旅游发展	-0.205***	0.038	-0.148	0.099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0.626***	0.051	0.599***	0.143
红色旅游发展×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1.256***	0.125	-1.166***	0.354
常数项	3.645***	0.028	-0.552	1.564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295		0.389	
观测值	18888		18888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分析

(一) 机制识别

1. 农村公共品机制。本文首先对红色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机制进行识别。为了保持研究的一致性，并且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部分机制检验所使用的数据为2002—2020年江西省内67个革命老区县域的面板数据。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本文基准回归使用的是全国革命老区县域面板数据，其范围较广、时间跨度较长，导致机制识别中农村基础公共品供给相关指标存在较多缺失值。并且，不同省份在村镇数据统计中所选取的统计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使用不同省份村镇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往往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第二，江西省是新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红色旅游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拥有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井冈山、瑞金、上饶等。并且，在本文样本中，江西省67个革命老区县域中仅有不到20个县域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这保证了双重差分模型有合理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因此，选择江西省作为机制分析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本部分将县乡公路里程、乡卫生院床位数、乡卫生院技术人员数、农村电话年末用户数和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作为农村公共品机制检验的验证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1)列~(5)列所示。

从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即发展红色旅游可以推动革命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收入

^①资料来源：《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开展主题实践教育，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红色旅游发展典型案例》，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zys/sjdt/202106/t20210609_1282901.html。

差距。上述结果符合现实观察。例如，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状态，自从发展红色旅游后，村民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政府也出资改造了进出黄洋界的古道，并修建红军小道，将景区与村民房屋串联起来，形成红色旅游精品路线。与此同时，为了保障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基础通信和卫生条件，地方政府增加了神山村网络基础设施和卫生医疗资源的投入，保证了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后，游客可以在网上预订民宿和餐饮服务，也可以自驾进入神山村旅游。在旅游旺季，神山村每天接待游客超过 1000 人次，2021 年村民人均收入近 3 万元，较发展红色旅游之前提高约 10 倍。因此，越来越多村民不再背井离乡务工，而是回到家乡依托红色旅游进行创业增收^①。

表 5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县乡公路 里程	乡卫生院 床位数	乡卫生院 技术人员数	农村电话 年末用户数	农村宽带 接入用户数	农村投资	非农就业
红色旅游发展	0.041** (0.017)	0.008*** (0.003)	0.018*** (0.004)	0.032*** (0.010)	0.034*** (0.012)	0.171*** (0.063)	0.246** (0.099)
常数项	7.244*** (0.630)	-0.885*** (0.103)	4.971*** (0.144)	-0.053 (0.365)	-1.466*** (0.455)	13.957*** (0.996)	-9.078*** (1.42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083	0.785	0.962	0.728	0.953	0.314	0.344
观测值	1206	1206	1206	1206	1206	12139	18888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2. 农村投资机制。从投资视角来看，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会引导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地区，以投资驱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本文利用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县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差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农村投资水平，并代入 (3) 式回归，结果见表 5 (6) 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在 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红色旅游发展可以带动革命老区农村投资增加，从而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理论预期一致。上述结果符合现实观察。例如，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夏蔚镇王庄村是中共山东分局诞生地、《大众日报》创刊地、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地、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旧址所在地，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生活过，拥有“华东小延安”的称号。沂水县通过发展红色旅游获得投资 3.32 亿元，在夏蔚镇王庄村规划建设“圣地红村”多元文化休闲旅游项目。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王庄村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①资料来源：《井冈山神山村：从“山区”到“景区”》，<http://www.jgs.gov.cn/news-show-24911.html>；《红色引领绿色崛起 村民日子越过越甜——回访井冈山市神山村》，<https://jxja.jxnews.com.cn/system/2022/04/18/019600904.shtml>。

显著带动了当地村民收入增长^①。

3. 非农就业机制。如上文理论机制分析所述，红色旅游发展可以帮助当地村民实现“离土不离乡”非农就业，从而促进村民收入增加。为了验证上述猜想，本文采用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数来衡量非农就业水平，并代入（3）式回归，结果如表5（7）列所示。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这意味着红色旅游发展对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促进效果。一般来说，非农部门的边际收益高于农业部门，因此，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意味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上述结果符合现实观察。例如，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地处罗霄山脉，交通闭塞，山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很小，在发展红色旅游之前当地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当地政府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使当地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凭借着红色旅游经济的带动，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得以热销。地方村委会也联合当地职业技术学校，组织开展乡村旅游和农家乐技能培训班，让村民获得“一技之长”，在更好地支持红色旅游发展的同时，红色旅游也反哺当地村民就业增收^②。

（二）异质性分析

1. 基于产业结构的异质性分析。发展红色旅游可以通过推动革命老区农村地区由原来农业主导型产业结构向以旅游服务业为主导的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周国富和陈菡彬（2021）研究指出，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助于转变农村地区劳动力生产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相较于第三产业较发达的革命老区，第三产业较落后的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应该更明显，即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更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县域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并根据样本所在县域和年度，基于中位数进行分组^③，然后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1）列和（2）列所示。结果显示，相较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在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更显著，并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在10%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发展红色旅游可通过带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

2. 基于宗族文化的异质性分析。红色旅游虽然是一项政治工程，但归根结底依然属于旅游产业范畴，因此政府在推动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往往面临信息不对称、激励不足和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为了缓解政府在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和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困难，一些学者尝试从宗族网络等非正式

^①资料来源：《红色资源“连线成片” 沂水打造“圣地红村”多元旅游体》，http://www.sdx.gov.cn/jzyl/agzyjyjd/201902/t20190221_11412698.htm。

^②资料来源：《湖南汝城县：“红色”沙洲 旅游扶贫急先锋》，https://nrta.gov.cn/art/2017/11/10/art_5_73186.html。

^③具体来说，如果某县域当年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于当年样本中位数，则将该县域划入第三产业较发达组，反之则划入第三产业较落后组。

制度中寻求突破。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来看，宗族由拥有共同祖先的单系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扩张形成，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Zhang，2020）、土地资源（仇童伟和罗必良，2021）和金融资源（刘冲等，2021）等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这些都有利于红色旅游产业发展。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宗族网络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促进乡村振兴，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徐凤增等，2021）。因此，本文预期，相较于宗族文化较薄弱的革命老区，在宗族文化较浓厚的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用更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参考刘冲等（2021）的研究方法，从《中国家谱总目》^①中搜集了明朝以来各地区的族谱数据，使用每百万人拥有家谱数量作为衡量宗族文化水平的指标，并按中位数对样本进行分组，将样本划分为宗族文化较浓厚组和宗族文化较薄弱组，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3）列和（4）列所示。结果显示，在宗族文化较浓厚地区，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更明显，并且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在10%水平上显著。该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城乡收入差距			
	(1) 第三产业较发达组	(2) 第三产业较落后组	(3) 宗族文化较浓厚组	(4) 宗族文化较薄弱组
红色旅游发展	-0.275* (0.164)	-0.512*** (0.139)	-0.441** (0.188)	-0.182* (0.098)
常数项	-3.651 (2.705)	1.332 (1.673)	0.140 (2.544)	2.205* (1.18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396	0.411	0.421	0.371
观测值	9444	9444	9444	9444
组间系数差异	0.237*		0.259*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县域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革命老区振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发展红色旅游对于推动革命老区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管理好红色文化遗产以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考察了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期在实践层面，从多维度拓展红色旅游发展促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发展红色旅游可以促进革命老区农

^①王鹤鸣，2008：《中国家谱总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村公共品供给、农村投资和非农就业，进而抑制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集体经济发展可以强化这一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第三产业较落后和宗族文化较浓厚的地区，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更明显。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利用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革命老区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革命老区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战略选择和规划布局中，应充分考虑红色旅游产业的经济外部性，从而制定科学的红色旅游产业振兴规划。第二，利用红色旅游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协同效应，在发挥各自优势并强化主体功能的基础上，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各具特色的老区产业结构，以帮助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和生活质量等值化。第三，充分利用乡村宗族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进一步提升革命老区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效用，从而最大化赋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第四，革命老区各地政府应该根据革命老区不同地方的产业发展差异，因地制宜地设计、制订更科学、更合理的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政策，进而充分发挥红色旅游对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赋能效用。

参考文献

- 1.陈军亚，2019：《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82-99页、第201页。
- 2.陈秋红，2019：《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基于农民需求的视角》，《改革》第6期，第92-101页。
- 3.陈锡文，2022：《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第4-9页。
- 4.龚斌磊、张启正、袁菱苒、刘晓光，2022：《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创新与效果评估》，《管理世界》第8期，第26-43页。
- 5.李晓园、徐威威、朱天义，2022：《革命老区乡村产业振兴的资源情境与行动逻辑——以江西瑞金红色产业发展为例》，《经济管理》第12期，第64-82页。
- 6.李永友、王超，2020：《集权式财政改革能够缩小城乡差距吗？——基于“乡财县管”准自然实验的证据》，《管理世界》第4期，第113-130页。
- 7.林淑君、郭凯明、龚六堂，2022：《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经济研究》第7期，第84-100页。
- 8.刘冲、刘莉亚、李庆宸，2021：《“排斥”还是“包容”：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银行发展》，《经济研究》第4期，第110-125页。
- 9.罗利玉，2021：《红色旅游发展的基本遵循与现实进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解读》，《社会科学家》第7期，第46-50页。
- 10.骆永民、骆熙、汪卢俊，2020：《农村基础设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与非农就业》，《管理世界》第12期，第91-121页。
- 11.吕炜、许宏伟，2015：《土地财政、城市偏向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财贸经济》第6期，第45-56页。
- 12.仇童伟、罗必良，2021：《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与地权稳定性》，《经济学动态》第9期，第77-92页。

- 13.谭娜、万金城、程振强, 2022: 《红色文化资源、旅游吸引与地区经济发展》, 《中国软科学》第1期, 第76-86页。
- 14.王守坤, 2017: 《政治资源禀赋的经济效应——来自长征沿线地区发展的证据》, 《经济研究》第12期, 第179-192页。
- 15.谢莉娟、万长松、武子歆, 2021: 《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公有制经济调节效应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第111-127页。
- 16.徐凤增、裘威、徐月华, 2021: 《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第12期, 第134-151页、第196页、第152页。
- 17.杨友宝、彭安琪、王荣成, 2022: 《长江经济带干线流域旅游产业系统环境脆弱性演变及障碍因子识别》, 《经济地理》第2期, 第212-221页。
- 18.张启正、袁菱苒、胡沛楠、龚斌磊, 2022: 《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第38-58页。
- 19.赵昕东、沈承放, 2022: 《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经济评论》第5期, 第117-128页。
- 20.周国富、陈菡彬, 2021: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统计研究》第2期, 第15-28页。
- 21.周娟, 2020: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以“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模式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第11期, 第16-24页。
- 22.周娟, 2021: 《村社集体在农业产业发展中的资源动员与“关系治理”——以农业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86-95页。
- 23.朱冬亮, 2020: 《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第123-144页、第207页。
- 24.朱秋博、朱晨、彭超、白军飞, 2022: 《信息化能促进农户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吗?》, 《经济学(季刊)》第1期, 第237-256页。
- 25.左冰, 2022: 《红色旅游发展中的央地关系研究——兼与Zhao & Timothy 商榷》, 《旅游学刊》第7期, 第38-53页。
- 26.Almond, D., H. Li, and S. Zhang, 2019, “Land Reform and Sex Sele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2): 560-585.
- 27.Baker, A. C., D. F. Larcker, and C. C. Y. Wang, 2022,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4(2): 370-395.
- 28.Hartley, R. P., C. Lamarche, and J. P. Ziliak, 2022, “Welfare Reform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epen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0(3): 523-565.
- 29.Jia, J., G. Ma, C. Qin, and L. Wang, 2020, “Place-based Policies, State-led Industrialis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m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123, 103398.
- 30.Lotfaliipour, M. R., T. E. Salari, M. S. Adibian, E. Kazemzadeh, A. A. K. Ahad, and F. A. Zarkami, 2021, “Impac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Iranian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18(3): 1-34.

31.Zhang, C., 2020, "Clans,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8(1): 100-123.

(作者单位: ¹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²江西红色旅游研究中心;

³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胡 祎)

Red Tourism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ZHANG Ke XIONG Ziyi HUANG Xijia ZHAO Le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vitalization plan of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red tourism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project, but also an economic project to enrich people. However, it lacks evidence to demonstrate whether red tourism can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This study builds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based on the classic scenic spots of red tourism as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Ou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can significantly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while collective economy can strengthen this effect,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in a series of robust checks addressing endogeneity. b)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red tourism can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y promoting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rural investment in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c)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red tourism on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larger for the region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clan culture and a less developed tertiary industry.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olicy makers to consider how to protect, manage, and utilize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Keywords: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Red Tourism; Urban-rural Income Gap; Collective Economy